

日本社会论

家与村的社会学

〔日〕鸟越皓之／著 王 颀／译



**ON JAPANESE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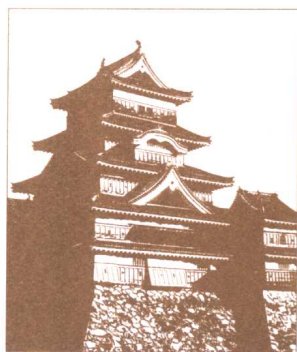
Sociology of
Family and Vill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赞助

〔日〕鸟越皓之／著 王 颖／译



日本社会论

家与村的社会学

ON JAPANESE SOCIETY

Sociology of
Family
and Vill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

著 者 / [日] 鸟越皓之

译 者 / 王 颖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经理 / 范广伟

责任编辑 / 范广伟 杨桂凤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7.75

字 数 / 136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230 - 174 - 2/D · 02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6 - 2224 号

登 记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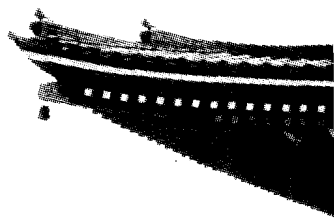
定 价 / 2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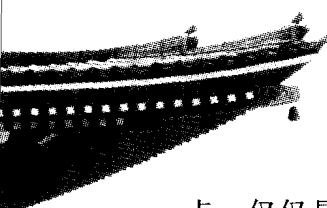
日本社会

——中文版序言

准确地找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特征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或者说是不可可能的也许更准确些。原因在于，同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由于风土与历史的差异，各个地域的发展都具有各自的特性。

但是，如果以日本为例，却存在这样一个特点，人们都使用相同的语言——日语，在外国人眼里，日本人都具有类似的行为举止、类似的思想方法、类似的情感。因此，理所当然地希望去理解类似的“共通基础”。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初次见面的人不只是可以安心地交谈，甚至能进一步理解日本人的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言论和行为。

本书呈献给读者的是对日本社会家与村的分析，希望能对读者理解日本社会有所帮助。本来用一句话来回答在日本的社会里到底存在不存在“共通基础”，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本书选取对家与村的分析作为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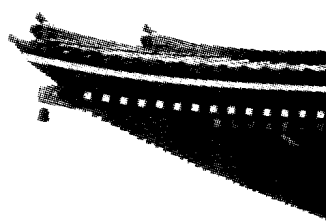


点，仅仅是为了说明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并且肯定也会存在着缺陷。

然而，本书也还有着自己的一些长处，关于这方面说明如下。

与中国相比较，中国人对于原理非常重视，而日本人的行为更多地归于“即兴”，也就是说，不把原理看得那么重要。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与此相似的观点。有孔子的儒教原理，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以这些原理作为社会的基础的倾向十分明显。笔者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采取“即兴”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原理出发来考虑问题，这种倾向是很突出的。

对于社会来说，共同的原理——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引入国家的——为什么是必要的呢？不只是中国，国家乃至村庄组织都要将原理普及到国民群众之中，用社会学理论来表述通常就是要建立这一国家的秩序，对于社会来说秩序是必要的。因而有利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情况，还有道德、政治的思想体系，以及与社会科学相近的原理。在同一个国家内，民族、地域特性多种多样，为了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而导入统一的原理，作为国家的领导者深感这是必要的。因为仅仅依靠权力来维持长期的秩序会使人感到不安。中国有着辽阔的土地，由于拥有众多民族及各自的特色，历史上自很久以前就建立了必要的、统一的原理，并且一直延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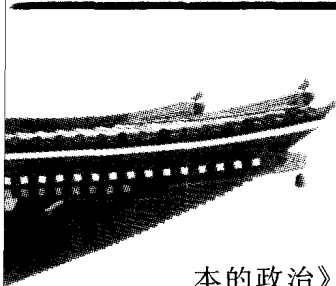


来，因此也形成了相应的国民性。

然而，日本有基督教、儒教及政治性的思想体系等，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原理，依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秩序呢？笔者认为，日本存在着“生活知识”。这里所说的“生活知识”是指生活中的常识、规则等。只要遵从这种知识，一个人就不会被周围的人们议论。这些知识主要是在家与村的传统中积累起来的，这也是从事家与村研究的意义之一。

在日本，人们把对家与村这种社会组织的秩序的维持，与对国家层次的秩序的维持结合起来。这样说是有很多证据的。家成员、村成员相互间良好的社会关系的维持，关系到社会的整体秩序的维持。也就是说，自己家的事搞好了，自己村的关系理顺了，其结果，社会与国家也就和谐了。的确，日本人经常把家与村的思维方式类推到其他组织，比如，把公司比拟为家，把社会政治组织比拟为村落。例如，如果国会议员说“这个问题需要回村商量”。说这种话的时候，就是指带着问题回到自己所属的政党的派系（指政党下面的组织）里商量。如果能确立起像这样的思想方法的话，社会整体的统一原理也就变得不那么必要了。政治学者京极纯一^①把日本人的这种思想方法抽象化为“内部秩序”（《日

^① 京极纯一，政治学者，东京大学、千叶大学教授。著有《政治意识之分析》（1968）、《日本的政治》（1983）等。



本的政治》)。以表述这种思想方法而著称的有经营学者三户公及其著作《作为“家”的日本社会》。

然而，这里有必要立即给予注释，以上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不存在统一的原理。反之，也不意味在中国不存在以家族、宗族，还有村落等共同体为基础的思想方法。中国有着自己更为重要的倾向，从这一点来看，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内部秩序”。大家都知道，这种体系化的“内部秩序”是以儒教以及围绕家与宗族等亲近关系的“生活知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强调程度问题而已。而且用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比较，从思想分析入手，通过家与村来分析“生活知识”，更容易理解日本的社会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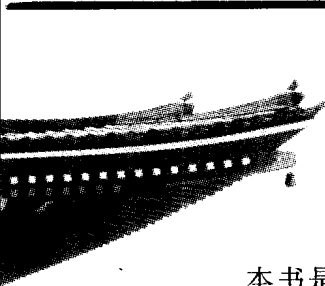
此外，本书的第二个长处是，从这种日常生活知识入手去理解日本社会，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教养（由文化人建立的）方面的日本文化。通过和辻哲郎等哲学家、岛崎藤村等文学家的作品来理解日本文化是重要的，可是，他们的思想方法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们所表现的“家”是怎样的呢？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若干疑问的答案。

本书也作为日本的大学教科书，许多学校都在使用，而且至今仍在使用。使用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的专业书在使用；第二类是作为学生了解日本社会基础的教材在使用。这种情况下的“基础”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不假思索地

对各种事态予以判断，运用自如地维系各种社会关系，换言之，称其为“传统的行为”也不为过。在传统的行为中，有一些“功夫”至今还令人感叹不已，学习这些“功夫”也是有益的。也许这是使用本书的第三个长处。

实际上，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一段时期内农村社会学得到相当多的社会学者的青睐。因此，曾在日本社会学领域里经常居于领先的地位。最初，日本社会学受到西欧社会学，其后又受到美国社会学的不断影响。由于美国缺乏原本意义上的“村”（Village，较为严密的是 Hamlet），所以，日本的农村社会学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开发农村社会学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些理论成果给予日本社会学其他领域的影响力是极强的。其中受到影响最强的是作为理论化的基础的“生活理论”。欧美社会学注重于“社会”，对“生活”则不甚注重。正因为对人们的生活的注重，家庭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产业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多种领域都受到了日本固有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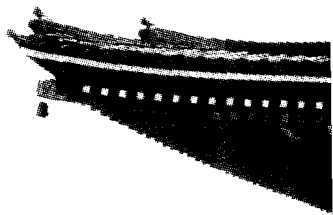
说到我自己切身的例子，我是农村社会学者，同时又是环境社会学者。日本环境社会学的模式被称为“生活环境主义”，这是与欧美发达的理论例如生态学理论尖锐对立的理论体系（详见鸟越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实践》）。顾名思义，这种生活环境主义模式是以生活理论为基础的，因此这种生活环境主义模式才逐渐被政府的环境政策所采纳。



本书是我向先辈及许多优秀的农村社会学者的农村专题研究成果学习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其精华的总结。同样，在中国以往的专题研究中有李景汉教授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这样的开端之作，此后优秀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不断地积累起来。我听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在组织进行“中国百村调查”的研究课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像这样将双方的研究积累加以对照，以及增进相互学习的机会是十分必要的。若本书能对此有些许帮助，笔者则颇感喜出望外。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是颇具朝气的专家王颀先生，实值庆幸。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李国庆先生也参与了针对本书内容的讨论，并给予译者卓有成效的鼎力支持。

鸟越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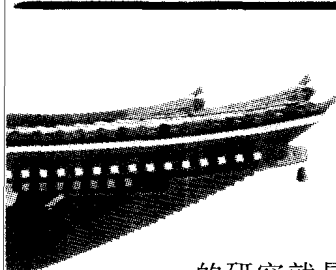


序

本书是以增进对家与村的理解为目的完成的。毋庸赘言，家与村都属于具有深刻内涵的制度体系和社会集团。因此，在我看来，这本小册子所能呈献的仅仅是关于家与村的一部分。

关于家与村的限定之一：本书关于家与村限定在社会学所关心的范畴。关于家与村，历史学、法律制度史、经济史等历史研究有着丰富的积累，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法社会学的研究也达到了值得肯定的水平。虽然本书有时也借鉴了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涉及。

限定之二：家与村是农村社会学（村落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而家及其相关的亲族又是家庭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从农村社会学范畴来考虑，家与村的研究并不是农村社会学的全部。可如果回顾一下农村社会学的学说史，家与村的研究又始终处于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中心。所以，有时给人的印象似乎家与村



的研究就是农村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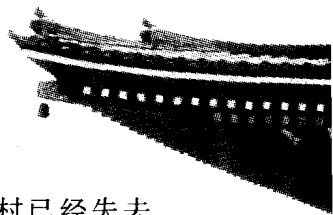
然而，正如北原淳所恰当地指出的那样：^① 社会学对家与村的研究，其分析过程是将家与村假定为封闭的体系，并以此为立足点探讨其内部的构造关系。结果，作为农村研究的分析方法之一，虽然有对家与村的社会学研究，可是从农村社会来说，家与村的真实状态却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

此外，莲见音彦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结构中，家与村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但是“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毋宁说是以高度的技术为背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战前相比有着不同的再生产结构，它是与农家生活基础的崩溃同时发展起来的。因此，遭到瓦解的地方的农家生活成为主要的问题，而不再是家与村，伴随生活的解体所产生的面对各个方向的主体回应以及以此为媒介或具体体现的组织化成为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家庭生活、地域生活问题，农民的意识问题，农民组织和与之对抗的地域社会的结构问题，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②。

莲见将家与村的重要意义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① 北原淳：《村社会》，见松本通晴编《地域生活社会学》，世界思想社，1983，第31页。

② 莲见音彦：《农村社会学的课题与构成》，见《农村社会学》“社会学讲座4”，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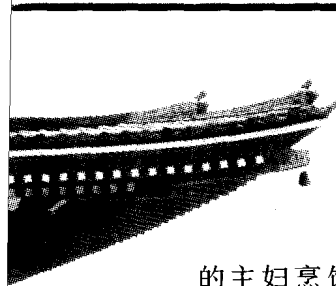
前，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战后的家与村已经失去了重要意义，只有具体的家庭生活、地域生活问题，农民的意识问题，农民组织和与之对抗的地域社会的结构问题等才能成为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莲见的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最近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也对这种见解的主要框架予以支持，并对此给予好评。

但是，当你一走入现实的农村，就会痛感，被表述为家庭生活的实体依然是表述为家的生活更为恰当，掌握着地域生活主体的实体也是村。此外，要了解当今的农民意识而与农民交谈的话，显然，如果抛开家与村意识也便不复存在了。进一步看，不用说官制下的农民组织，就连与农村地域的环境问题等有关的农民志愿者组织，也都将家与村纳入视野开展各种运动。（我们学术界却在讨论家的解体、村的解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家与村同战后的家与村相比，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彼此不同。但是，舍弃了家与村要表现其实体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此外，确实可以发现一些从以往的家与村的组织结构中脱离出来，建立起新的农业生产组织的地带，也有这样的研究报告发表。而且在村庄里也有否定家与村的人，这种动向并非不存在。

然而，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由此派生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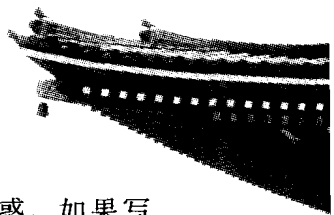
的主妇烹饪教室、妈妈排球、老人门球，像这样“摩登”的事物的举办也大都与村组织相关联。如果去了解那些亲戚或熟人间的纠纷，也同样是和家与村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上对莲见的观点给予了大致评价，但是，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作为基础理论也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家与村。

基于这样的想法，本书没有将家与村的理论论争史作为重点，而是更多地对实体予以记述，尽力使立志于学习家与村的实践者在其进村时避免不知所措。本家、分家具有什么意义，“ikke”和“maki”^① 包含的性质，还有所谓“村”在当地所指代的究竟是什么，区长是什么人，村里修路工程中的协同劳动占有什么位置，什么叫做“讲”，什么叫做“组”，本书力图把这些内容记述下来。关于家和同族问题，社会学在理论上有很大的进展，作为农村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一般知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虽然有些繁杂，但还是拿出一些篇幅来解释这些理论。

最后还有一点要予以说明，如果通读过本书马上会发现，本书没有论及到家、同族、“讲”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和变迁。把握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变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对于这本小册子来说却是超负荷的。在写作

① 方言，意指亲戚、亲属关系，原文为日语假名标注的读音。——译者注



过程中，笔者常常受到把变化也写出来的诱惑。如果写变化就必须写出引起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但这是本书的篇幅所不允许的，需要另写一本书。

换句话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属于所谓的文化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文化论的研究方法的缺点是：从方法论方面看，没有太多地考虑社会变迁、社会变化。有时甚至把近世与现在视为一体。^①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

- ① 指出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并不意味着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否定。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固有的缺点内藏其中，这也是多种研究方法同时存在的原因。与文化论的研究方法相对的研究方法，是避开只注意个别民族的个别性，去关注人类社会共同的一般变化与特性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典型例子。（不过，马克思本人在给维拉·伊凡诺夫娜·扎休莱契的信简中，将他研究的直接适用范围限定在西欧。）

[维拉·伊凡诺夫娜·扎休莱契（Vera Ivanovna Zasulich，1849～1919），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院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在1881年3月写给维拉·伊凡诺夫娜·扎休莱契的一封信中，谈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指出俄罗斯从“个体私有的分散的生产方式”向“社会集中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可以通过不同于西欧国家的路径，因为俄国有可能完成“农业社会的跳跃性发展”，“农业社会遍布全国，可以直接成为集体生产的基础，而工业时代的成果是可以直接承继过来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本人将其研究的直接适用范围限定在西欧。——译者注]

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注重社会条件的社会条件论的研究方法。某一社会特性（例如日本式经营）是其社会的（转下页注）

在于，对于家与村的结构原理和支撑这一构成原理的价值、规范可以做出直接的阐释。

本书是在以上各种限定的前提下写成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个基础，我相信，以此为出发点，各种取向的理论和思考都将得到发展。

（上接第6页注①）产物，如果支撑那个社会产物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其社会特性理所当然会瓦解。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关注社会条件的变化，往往成为对较短时期（最长也不过40~50年）历史的分析。例如，经济学者熊泽诚从社会条件论的方法出发，对日本的“年功制度”所进行的分析（《日本的劳动者形象》，筑摩书房，1981）。

从社会条件论的研究方法出发，对文化论的研究方法及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加以批判的，有研究劳资关系论的经济学者津田真澄的《现代经营与共同体》（同文馆，1981）。此外，关于文化论的研究方法与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论战，中野卓与富永健一之间的争论（《文化中心通信》第6期，御茶水书房，1981年12月）具有启示作用。（实际上，中野本人并不是文化论的方法论者，他被看作立足于文化论与社会条件论两种方法之上的学者。）

关于文化论研究方法与社会条件论的研究方法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盐原勉给予了恰当的评价。盐原勉说，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在于两种方法的对象及其时间跨度切割的差别（文化论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是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较长），两者的差别（前者以价值、规范为对象，后者以资源、技术为对象）如果从社会体系论的控制与条件赋予的视角给予说明，是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联性的（《组织与运动理论》，新曜社，1976）。他的观点值得参考。

日本社会——中文版序言 / 1

序 / 1

第1章 家的逻辑 / 1

一 家与家成员 / 4

(一) 怎样理解家 / 4

日常生活话语 / 4

社会科学特性 / 5

因民族不同对家庭理解的差异 / 7

家与家庭 / 8

(二) 家的结构 / 12

家的三个特征 / 12

关于非亲族 / 14

家是如何构成的 / 16

(三) 直系家庭制下的核心家庭形态 / 24

直系家庭与核心家庭 /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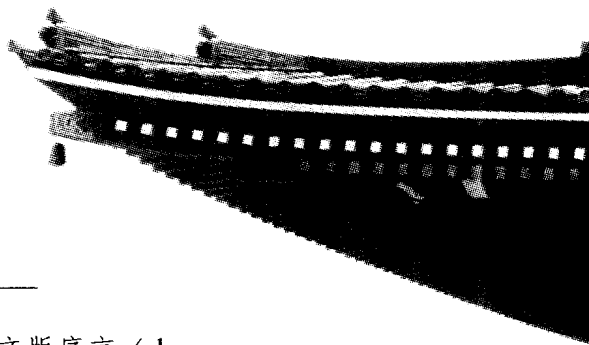
家的周期 /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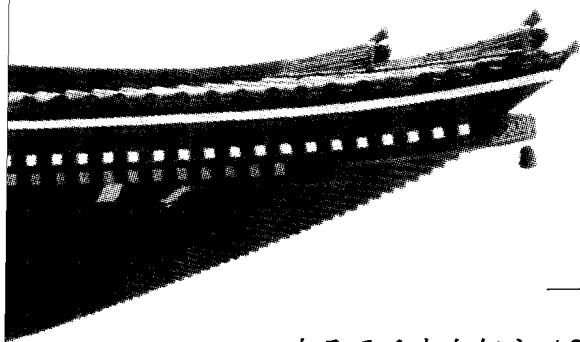
家的旁系 / 27

制度与现实的偏差 / 27

二 家的先祖与日本人的祖灵观 / 29

(一) 灵魂与神 / 29





- 自己死后去向何方 / 29
- 灵魂的存在与向神的升华 / 30
- 佛教与日本人的祖灵观 / 31
- 作为鬼魂节的盂兰盆节与正月 / 31
- 成为先祖的过程 / 34
- 彷徨的灵魂 / 35
- (二) 各种各样的先祖类型 / 36
- 两种“佛” / 36
- 去人格的先祖与有人格的先祖 / 39
- 出身的先祖 / 42
- 两种“出身的先祖” / 44
- (三) 系谱的先祖与象征性的先祖 / 45
- 作为“祖”的系谱的先祖 / 45
- 表示社会地位的象征性的先祖 / 47
- 三 家的联合体——同族、亲类 / 48
- (一) 超越家之上的各家间的关系 / 48
- 亲戚们 / 48
- 多样的现实 / 49
- 两种亲族组织 / 50
- 同族的意义 / 52
- 亲类的意义 / 54